

中国早期文学研究

◎ 刘凤泉 著



齊魯書社

I206.2/174

2008

中国早期文学研究

◎ 刘凤泉 著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早期文学研究 / 刘凤泉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8. 5

ISBN 978-7-5333-1993-9

I. 中… II. 刘…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7313 号

中国早期文学研究

刘凤泉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日照日报印务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 32

印 张 12.75

字 数 326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1993-9

定价: 30.00 元

目 录

| | |
|----------------------------|-------|
| 导 论 早期文学研究的科学观念 | (1) |
| 第一章 早期议论文学 | (21) |
| 一 《易经》卦爻辞中格言和谚语的文学价值 | (23) |
| 二 先秦诸子散文的审美构成 | (40) |
| 三 韩非政论的文学特征 | (59) |
| 四 韩非政论的文学风格 | (70) |
| 五 韩非政论的文学价值 | (77) |
| 附一 曾皙“志向”辨 | (95) |
| 附二 笔落千秋著文章 | (100) |
| 第二章 早期叙事文学 | (102) |
| 一 先秦两汉“小说”概念辨证 | (104) |
| 二 神话传说中的小说因素 | (116) |
| 三 战国游说故事中的小说因素 | (125) |
| 四 《左传》的叙事文学价值 | (133) |
| 五 “纪传体”和传记文学 | (145) |
| 第三章 早期抒情文学 | (154) |
| 一 “二雅”政治抒情诗 | (156) |
| 二 楚辞演进之轨迹 | (166) |
| 三 《采薇》末章的审美因素 | (178) |
| 四 古籍阅读之“易字” | (182) |
| 五 释“载” | (187) |
| 六 “于耜”、“举趾”辨义 | (190) |

| | |
|-------------------------|--------------|
| 附一 此情无计可消除 | (194) |
| 附二 折花相思 意婉情浓 | (203) |
| 附三 古典豪放词的现代终结 | (204) |
| 附四 一株雄健瑰丽的奇葩 | (212) |
| 第四章 早期文学思想 | (215) |
| 一 儒家的诗教论 | (217) |
| 二 道家的“意象”论 | (252) |
| 三 战国纵横家的文学思想 | (266) |
| 四 司马迁文学思想之主体性 | (280) |
| 附一 文学发展的矛盾运动 | (293) |
| 附二 社会过程中的文学发展 | (299) |
| 附三 王晚堂与《历下偶谈》 | (308) |
| 第五章 早期文化观念 | (319) |
| 一 原始意识形态及神话的积极意义 | (321) |
| 二 “贵和”思想之文化渊源 | (333) |
| 三 孟子思想及其影响 | (357) |
| 四 孟子、荀子人论之比较 | (367) |
| 五 “中庸”思想与社会和谐 | (381) |
| 附一 道学源流与《近思录》 | (389) |
| 附二 传统蒙学的精品 | (397) |
| 后 记 | (399) |

导 论 早期文学研究的科学观念

中国早期文学处在中国文学历史长河的上游,它以非凡的思想创造和丰富的艺术成就源源不断地滋养着漫长而浩瀚的中国文学。早期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精神宝库和行进坐标,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所以,早期文学的研究已经超越它自身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人们对于早期文学的高度重视,自然使早期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要进一步推动早期文学的研究,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以为,早期文学研究存在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科学观念的淡薄。我们知道,文学是艺术,而文学研究是科学。加强科学观念是促进文学研究的准确性和深刻性的必要条件,而科学观念的淡薄则会使文学研究出现似是而非、模糊混乱的现象。

早期文学研究之科学观念的淡薄的具体表现有多种:审美文学观念淡薄、历时发展观念淡薄、地域文化观念淡薄、系统整体观念淡薄、学术资信观念淡薄,等等。这些现象积染成习,已经成为早期文学研究发展的桎梏。打破积习桎梏,加强科学观念,是早期文学研究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

所谓“早期文学”,是指“文学自觉时代”之前的文学。这个时期的文学包括两种形态:一是与物质生产交织在一起的原始文学,我们称之为“源文学”;二是与其他意识形态掺杂混生的文学,我们称之为“杂文学”。中国早期文学主要包括通常所说的“先秦文学”和“秦汉文学”。有时,为了方便人们的理解,本书也以“先秦文学”和“秦汉文学”来指称早期文学的部分内容,尽管这样做是不够严谨的。

一 确立审美文学观念

文学研究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是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的基本特征。早期文学研究以早期文学为研究对象,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正确认识。所以,什么是文学?什么不是文学?这是早期文学研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然而,由于对象自身的复杂和传统观念的沿袭,早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着审美文学观念淡薄的现象。

就对象而言,早期文学处在文学观念尚未成熟的阶段,其中文学与非文学杂糅共处,难解难分,充满着非文学向文学的演进,不自觉向自觉的提升,实用向审美的转化的各种复杂状态。在这样复杂的对象面前,文学观念的确立就显得有些困难了。

就传统而言,人们沿袭了以经学、目录学、史学的视角看待先秦典籍的传统做法,以文学的眼光研究早期文学的规范还没有很好形成。所以,赵逵夫先生指出:研究先秦文学要用文学的眼光,需要突破三种思想的束缚:一是突破经学思想的束缚,二是要突破史学的束缚,三是要破除成见的束缚。^①

譬如:“诸子散文”的研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首先,人们往往忽略研究对象的文学性质。

“诸子散文”不是单纯的文学概念。散文有广、狭二义,就广义来说,散文与韵文相对,凡不韵者皆为散文。至于“诸子”之称,也不是从文学角度立名。称“诸子”始于汉代,用来指称先秦各学派。《史记·贾谊传》云:“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②;《汉书·艺

① 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3,(4)。

② (汉)司马迁,屈原贾生列传[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2,第 2491 页。

文志》云：“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①具体而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提到“诸子”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②；班固《汉书·诸子略》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③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诸子散文”以“诸子”来限定“散文”，只是指这些学派的著作，并不是单纯的文学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诸子散文”，显然并不都是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早期文学研究中，先秦各学派的著作纷然杂陈，人们不去厘清研究对象的审美文学性质，就把它们都作为早期文学研究的对象，这势必导致文学研究特性的消解，从而造成早期文学研究对象的模糊。

其次，人们也不注重研究主体的文学眼光。

“诸子散文”是文学与非文学的杂糅，主体的研究视角存在差异，得到的认识便有差异，真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缺乏明确的审美文学观念，加之传统的经学、目录学、史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从“诸子散文”中看到的更多是学派的论争、深刻的哲理、具体的史料、知识的传承，而“诸子散文”之个性化的语言、精巧的结构、社会的激情、独特的形象、丰富的意蕴却往往被置之一旁。审美文学观念的淡薄，自然带来文学研究的含混。在“诸子散文”研究的名目下，存在着大量的非文学研究。举凡名物、考证、制度、经济、历史、科学、逻辑、哲学，都挤进了文学研究的领域，早期文学研究的文学特性被淹没在泛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如果这样的现象长期存在，那么，早期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学科研究的基本特征便消解殆尽，早期文学研究岂不成了一个学术空壳？

确立审美文学观念是早期文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说，面对研究对象，首先要追问：这是不是文学？当然，先秦时代文学观念

① (汉)班固,艺文志[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01页。

② (汉)司马迁,论六家要旨[A],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3288页。

③ (汉)班固,诸子略[A],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1746页。

还没有自觉,早期文学的纯文学作品也不是很多。以今天的审美文学观念对早期文学研究对象作一番简单的取舍,自然是不符合实际的。然而,这并不能成为搁置审美文学观念的理由。审美文学观念是人类长期以来对文学特性深入认识的理论成果,站在审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才能科学地厘清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

早期文学具有特殊性,文学与非文学杂糅共处,文学还没有从其他意识形态中独立出来。静态的理解审美的文学,早期文学研究对象将出现严重匮乏的局面。应该看到,文学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对审美的文学也必须作动态的理解,这是一种演进的文学观念。早期文学在文学与非文学的杂糅中,实际上体现了文学萌生、成长、走向成熟的发展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体现了非文学向文学的演进,不自觉向自觉的提升,实用向审美的转化的文学发展进程。从演进的文学观念出发,就能科学地对待非文学与文学的杂糅,理性地鉴别这些复杂状态在整个文学发展过程中对于审美文学之重要价值。

所以,只有确立演进的审美文学观念,才能科学地审视早期文学研究的对象。我们不再是简单地追问:这是不是文学?而是深入地追问:这是不是文学发展的必要环节?这样,我们就能克服早期文学研究中审美文学观念淡薄的积习,净化早期文学研究中的含混状态,科学地确定早期文学研究的对象,以文学的眼光实事求是地展示出早期文学的发展历史。

二 彰显历时发展观念

早期文学包括了漫长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而由于年代久远,人们对这些文学现象的时序感有些淡薄了。就像人们瞭望遥远的星辰,很容易将不同距离的天体看做是相等距离一样,人们也很容易把历时的作品看做是共时的存在。在早期文学研究中,时序观念的淡薄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如《诗经》包含了近五百年的诗歌,这其实就是一部漫长的诗歌发展史。而在《诗经》研究中,人们往往淡化了时序因素,只把它当作“一部书”来研究,缺乏对这部诗歌发展史的历时观照。我们谈《诗经》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可是要知道,在五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任凭什么样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征都该会发生一些变化吧!以静止的眼光来看待《诗经》,显然不能科学地反映《诗经》的本来面貌。如果把《诗经》中的作品尽可能加以系年,按时序排列出来,那倒肯定可以有所发现的。在《诗经》研究中突出历时观念,是科学地描述《诗经》五百年诗歌演进轨迹的前提。

又如,《尚书》包含的文章时间跨度在一千年以上,从口耳相传到著于竹帛,它携带着漫长历史过程中的文学信息。淡化了时序因素,只做共时的研究,又怎么能够展示这一千年中的文学演化进程?

再如,《庄子》是庄周和他后学著作的汇编,如果不加区别一视同仁,那就既不能准确理解庄子的思想和庄子后学的思想,也不能科学描述文学的发展进程。《庄子》外篇有《盗跖》、《说剑》等虚构的故事,有情节,有人物,语言简练,结构完整,主题突出,它们与后世小说是比较接近的。但据此而得出“庄子是小说之祖”的结论则是荒谬的。因为《盗跖》、《说剑》属于《庄子》的外篇,并不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刘笑敢先生通过汉语词汇单纯词在先(如精、神)复合词在后(如精神)的发展规律,证明《庄子》书中内篇在前,外篇、杂篇在后的历史顺序。他以作品时序的考证为基础,将庄子的思想与庄子后学的思想分别开来,又将庄子后学的思想分为述庄派、无君派和黄老派。^① 这项考证成果对于《庄子》文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早期文学研究中的时序观念是非常重要的。突出时序观念,就是实事求是地承认早期著作的特殊形成方式。早期著作形成方式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① 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一是作品的引述性较强。孔子称“述而不作”，其实许多作者也是引述重于创造，这就使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汇集了不同时代的材料。如《易经》中辑录有古老的格言和谚语；《左传》、《国语》也引述着久远的文学材料；《韩非子》之《说林》、《内储说》、《外储说》中辑录的历史故事、民间故事并不是韩非本人的创造；甚至，汉代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也存在有许多先秦文学的材料。

二是作者的人数多。早期著作多是一个学派著作的汇编，包括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的作品，当然显示了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的具体状况。如《论语》中有孔子的弟子与再传弟子的东西；《庄子》是庄周和他后学著作的汇编；《管子》更是不同时代、多个学派、多位作者的作品丛编。

三是著作的成书过程长。早期著作由口耳相传到著于竹帛，由单篇流传到汇聚成册，往往经过后人整理；有一个逐步完成的过程。如《山海经》之“山经”、“海经”、“大荒经”和“海内经”，内容就表现出明显的不一致。袁珂先生说：“传说中的禹、益，虽非《山海经》的直接作者，但书中的主要内容，仍有可能是由原始社会末期的酋长兼巫师的禹、益口述而世代相传下来的。”^①他认为，《山海经》成书于战国初年至汉初之间，其中以“大荒经”以下五篇为最早；成书于战国初年至中期，“五藏山经”和“海外经”成于战国中期至晚期。而现在流行的《山海经》则是在汉哀帝元年（公元六年）由刘向、刘歆父子带领一批校书大臣所校定而成的。

早期著作形成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早期文学研究中时序观念的重要性。对于这样一种特殊的对象，突出时序观念是研究者的基本科学态度，而时序观念淡薄则必然会带来混乱现象。

自然时序的考定只是早期文学研究的基础；而以自然时序为基础，揭示早期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才是早期文学研究的重要目标。

^① 袁珂，山海经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1，第 6 页。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不断演进的;从根本上来说,文学发展也遵循着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只有以发展的观念看待早期文学,才能透过研究对象的自然时序探寻到文学演进的历史轨迹。因此,自然时序观念进一步提升,彰显文学发展的观念,对于早期文学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譬如,《老子》五千言多用诗化的语句表达哲理,被人誉为哲理诗。我们惊叹于作者伟大创造的同时,不能不去探索这个伟大创造的思想与文学基础。《易经》成书于西周末年,《老子》产生于春秋末季,《老子》的作者在进行哲学创造和文学创作时,《易经》是供他参考吸收的重要思想资料与文学资料。过去囿于《易经》是儒家经典,《老子》是道家经典的成见,人们对二者的密切联系认识不足。其实,《易经》影响《老子》的痕迹比比皆是。就思想联系言,《老子》的许多思想渊源于《易经》;就文体联系言,《老子》用韵语表达哲理的方式受到《易经》格言和谚语用韵语表达主体看法的方式的启发。将《易经》卦爻辞中格言和谚语看做是《老子》哲理诗产生的基础,完全符合思想发展和文学发展的逻辑。如果没有《易经》这样一个环节,那么《老子》哲理诗倒显得太横空出世,让人无法理解了。因此,我们认为:《老子》哲理诗与《易经》卦爻辞中格言和谚语存在着密切的源流关系。^①

其实,承源于格言和谚语而发展起来的文体并不止《老子》哲理诗。如箴铭体裁脱胎于格言和谚语。格言和谚语由民间流传而被引入“天子听政”的朝堂,它们劝诫说理的功能便得到加强。这些劝诫说理一旦具有针对性和经常性,那么格言和谚语就有可能转化为箴铭。刘勰称:“昔帝轩刻舆几以弼违;大禹勒筍箴而招谏;成汤盘盂,著日新之规;武王户席,题必戒之训;周公慎言于金人;仲尼革容于敬

^① 刘凤泉,论《易经》卦爻辞中格言和谚语的文学价值[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03,(2)。

器。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①又如寓言得益于格言和谚语。寓言文体的成熟得益于比喻和象征的发展,而在早期的格言和谚语中,比喻就是重要的表现手段。确切而生动的比喻将具体形象和一般观念联系在一起,为寓言的产生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沿着自然时序清理文学脉络,就会发现以格言和谚语为源头,议论文学经历了多种具体的文体形式,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和发展,终于迎来了战国时期议论文的繁荣。

只有重视时序,早期文学研究才能走向科学;只有强调发展,早期文学研究才能走向深入。彰显历时发展观念是早期文学研究的必然选择。

三 体现地域文化观念

文学是文化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文化总是一定族群在具体的历史和地域中创造出来的。文学在文化肌体中的新陈代谢,自然与文化具体存在的历史和地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早期文学是早期文化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早期文化表现为由部族多元文化向华夏文化的转成,表现为南方荆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的融汇,表现为不同地域文化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早期文学研究忽视地域文化观念,就不能科学地阐释文学的特征与文学的发展。

远古时代,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数以百计的原始氏族。这些原始氏族经过长期融合,到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形成了比较大的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东方有“东夷”族,他们以鸟为图腾,其中最大一支是太皞族。南方诸族,后人统称为

^① 陆侃如、牟世金,《铭箴》[A],《文心雕龙译注》[M],济南:齐鲁书社1995,第190页。

“蛮族”，其中最大一支是九黎族。西方有羌、戎二族，分别以羊、熊为图腾；他们中的一部分最早进入中原，分别构成黄帝、炎帝两族的主体。北方有以游牧为生的“狄族”。这些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在不同的地域，发展出不同的氏族文化。早期文学之神话便根植于这些氏族文化之中。所以，神话研究应该考量氏族文化背景，具体地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深刻地理解他们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全面地认识他们之间的冲突、融合的历史。李炳海先生认为：“把先秦文学和部族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可以拓宽视野，解决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一些问题。”^①他的《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正是这方面的重要收获。

商周以来，由于地理环境、气候因素、生产方式、历史传承、社会制度、语言习俗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以河南为中心沿黄河由西而东的中原文化，和以湖北为中心处于长江、汉水、淮水之间的荆楚文化。在两个文化系列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学，都打上了地域文化的鲜明烙印。在荆楚文化背景下，孕育了想象翩飞，色彩瑰丽的浪漫主义文学。庄子寓言，汪洋恣肆，随意吐属，如行云流水；楚辞悲歌，铺采摘文、神思驰骋，似天籁“九歌”。在中原文化土壤中，创造出思维缜密，风格雅正的理性主义作品。儒、墨言理，法家论政，着眼于现实政治；《左传》记事，《国语》记言，属意于历史经验。南北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只有在南北文化的不同基础上才能得到理解。

忽视文学的地域文化特性，就不能准确理解具体的文学现象。譬如，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完全是在荆楚文化肌体中自主发展起来的文学形式。研究楚辞产生的原因，应该从荆楚文化内部去探求，即从荆楚文化之民歌民乐、神话传说、宗教习俗等

^① 李炳海，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第1-2页。

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去理解楚辞的发生。那种忽视文学在文化肌体中的自主发展,企图在《诗经》与楚辞之间架设一座直通桥梁的尝试,是不符合文学发展实际的。楚辞无疑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有通过荆楚文化内在因素的中介才能实现。

当然,文学与文化不是封闭的体系,文学在文化肌体中的自主发展,并不排斥外在的文化与文学因素对之发生重要的影响。对于华夏文化系统中的荆楚文化和中原文化而言,不同文学、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在这个意义上,楚辞吸收了中原文化的丰富营养也是很自然的。就内容言,屈原作品中所灌注的革新政治的思想,已经超越了荆楚文化,是战国时代“国际”政治思想的主流;就形式言,《天问》、《桔颂》的四言体制不能说没有受到《诗经》的影响。文学在文化肌体中的自主发展和文学在不同文化交融中实现交流和融合,都与地域文化特征密切相关。

秦王朝统一全国,客观上为地域文化的融合创造了新的政治空间,所谓“书同文,行同伦”,对思想文化的统一是有积极意义的。汉王朝的建立,使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汇走入了快车道。汉承秦制,文尚楚风,南北文学的融汇更得到积极推进。汉初皇帝、藩王多喜爱楚辞,使楚辞由地域性文学扩散到全国范围,它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影响人们,从而给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汉代人学习楚辞,在文学精神和语言辞章上都很有收益。刘熙载言:“学《离骚》得其情者为太史公,得其辞者为司马长卿。”^①在散文、诗赋两个领域,司马迁和司马相如继承了屈原的文学传统,进而积极创造,取得了伟大的文学成就。汉赋“得其辞”,突出文学的审美特征;《史记》“得其情”,突出文学的本质特性。汉代文学两司马,最终完成了南北文学的融汇,形成了统一的汉文学,使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既注意地域文化因素对文学特征的内在规定,也注意不同地域

^① (清)刘熙载,艺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第12页。

文化的交融对文学发展的积极促进。早期文学研究体现地域文化观念,对于深入揭示文学发生、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外在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四 具备系统整体观念

文学发展是一个动态系统,文学研究应该对文学动态系统形成整体的解释的理论体系。而早期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不足,这主要表现为对研究对象既缺乏整体的理论思考,也没有细致的科学分析,从而不具备系统整体的观念。

譬如,从科学概念的要求看,通常所说的“先秦文学”概念就比较模糊。“先秦文学”除了从时代上限定文学外,看不出它所指称事物的整体特性。“先秦”指秦王朝之前,而秦王朝之前的文学并不具有完整统一的特殊本质。神话叙事与史传叙事不同,宗教祭歌与政治抒情有别。它们在创作思维、思想内容、艺术表现都存在本质的区别。为什么要把它们不加分析地都装在“先秦文学”这只口袋里呢?还有,先秦文学到秦汉文学又发生了怎样的重要变化?它们之间又有怎样的本质区别?我们知道,汉代政论直承先秦政论而来,《史记》叙事有直接取自《战国策》者,它们之间一脉相承,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为什么要将它们人为地加以割裂?把不同本质的事物放在一起,把相同本质的事物割裂开来,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方法。笔者以为,“先秦文学”并不指称一个有整体特性的事物,这个概念本身的科学性是值得怀疑的。所以,我们用“早期文学”概念来指称“文学自觉时代”之前的文学。

又如,“先秦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是缺乏科学分析的。赵逵夫先生指出:“从二十世纪初中国人写的第一部中国文学史起至今将近百年,人们对先秦文学的研究仍然是在‘两类文章两部书’(史传、诸子、《诗经》、《楚辞》)的框架下进行。文学史的编写,基本上是按

这四大块进行论述,文学史的研究,也无形中受到这四个框架的制约。有的在前面加上‘神话与原始歌谣’,在后面加上‘秦代文学’。很少有突破这个结构方式的。”^①这样的研究框架与科学的分类体系相去甚远,《诗经》、《楚辞》是传统目录学的继承,史传、诸子乃是四库分类的遗存,神话、歌谣才稍微有了一点现代文体的意识。

这个框架不能科学地揭示研究对象的类别特征,所以在这个框架下的研究也就往往出现指鹿为马的混乱现象。比如,讲到《诗经》的艺术特点,一般文学史总是笼统的那么几条。其实,风、雅、颂的艺术特点不一样,十五国风的艺术特点也不相同,叙事诗、抒情诗、咏物诗艺术特点有区别。这里既有五百年间历史嬗变的因素,也有东西南北流行地域的因素,还有不同文体形式的因素,那些缺乏具体分析的笼统的议论,当然不能成为严谨的科学结论。

又如,“史传”主要以叙事为主,但也包含着丰富的议论文学,不加区别地笼统地谈论“史传”的文学成就,往往会隔靴搔痒而不得要领。“史传”中的行人辞令、名臣议论、纵横说辞都属于议论文的范畴,如果不从议论文学的角度研究,那么实在是很大的缺憾。再如,“诸子”以议论为主,但其中包含有非常精彩的叙事文学,《论语》的“侍坐言志”,《墨子》的“杜伯复仇”,《孟子》的“齐人妻妾”,《庄子》的虚构寓言,《韩非子》的民间故事,它们都是叙事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忽视它们的存在而不加分析,自然不能准确的认识它们文学价值。

在早期文学研究中,由于研究框架科学品性的缺乏,极大地制约了文学研究的深入,导致了太多的不切实际的议论,这当然有碍于科学地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所以,早期文学研究要走出困境,需要具备系统整体的观念。

首先,应该具有文学形态的观念。

^① 赵逵夫,拭目重观,气象壮阔——论先秦文学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学报 2003,(4)。